

名家对谈

与贾平凹关于长篇新作《暂坐》的对话——

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，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

对谈人：贾平凹 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王雪瑛 本报记者

翻越秦岭，走出古镇，他到了古都西京。从莽莽苍苍的秦岭，回到熙熙攘攘的西京，从《山本》中战火硝烟的古镇，返回人来人往的茶庄，《暂坐》是贾平凹的第18部长篇小说，刊发于《当代》杂志2020年第三期，也是1993年出版的《废都》之后的第二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。他在乡村题材上长期深耕与丰厚积累，这次小说题材上的迁徙，又一次直面现代城市生活：以悲悯仁厚的目光注视着身旁人来人往的西京古城，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勾勒着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轨迹。

既是具体的人的故事，
又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故事

文汇报：你在后记中说，“整整写了两年，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，它写了四遍。”请说说这部长篇的创作情况，曾经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做过重要修改吗？

贾平凹：《废都》之后，其实还有关于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，如《白夜》《高兴》，只是那些作品主要写了农民工进城后的生活。《暂坐》在题材上，所谓迁徙是没有多大障碍，因为我在城里生活了近50年，一切都是熟悉的，之所以写得慢，一直在纠结着怎么写，那么多的人物，没有什么大情节，没有什么传奇故事，怎么个视点，从哪里切入，如何结构？写了四遍，前两遍都觉得不对，作废了，写作是越写越惊恐，来不得一点敷衍呀。总得有自己的思索，新的写法呀。

文汇报：《山本》的结构方式很独特，全书不分章节，不设标题，仅以空行表示叙事的节奏和内容的转换；《暂坐》与《山本》全然不同，结构布局别开生面：每小节都以人物和空间来命名，空间对于塑造女性人物群像，呈现城市日常生活重要？对小说的结构重要？

贾平凹：《暂坐》里分节，每节以人物和地点命名，这是结构需要，因为没有大情节，那些日常生活的叙写仅有些线索，再者这么散开写可以充盈弥漫我还要表现的东西，比如雾霾，比如所有的市井现象，因为那群女子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，追求故事为什么发生？从而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，并更好地探讨复杂的人性。还有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，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，而应有生活的智慧和，这样分节容易表现。

文汇报：在写作《山本》的时候，你曾经说过，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庞杂的素材如何进入小说，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，那么在写作《暂坐》的时候，你面临的是如何呈现如此切近的现实？

贾平凹：写作并不是逮着什么写什么，我在城市生活了近50年，阅了那么多的人和事，但在这些人和事里发现了什么，这些发现又都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也是写作冲动的理由。《暂坐》里的那些女子是有原型的，我和那些原型常在一起，她们是一群别样的女子，过着别样的日子。面对着她们们的日常生活，有一日忽然觉得有意味，这意味与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有关，一下子有了写作欲望。写作欲望一产生，那么多的素材就会来了。

文汇报：西京城的暂坐茶庄，是小说人物活动与情节展开的主要场景，也成为小说命名为《暂坐》最直接的解释，但“暂坐”分明蕴含着更多的人生内涵……请说说“暂坐”的丰富意蕴。

贾平凹：人生就是“暂坐”呀，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“暂坐”呀。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，是人活着的意义，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，她们在经济独立后，怎样追求自在、潇洒、时尚和文艺范，又怎样的艰辛、迷惘、无奈、堕落。其中冯迎的线索，陆以可父亲的线索，“活佛”的线索等等，甚或一开茶馆二楼上的壁画都是以此而设置的。

文汇报：从1993发表长篇小说《废都》到2020年出版《暂坐》，时间跨度为20多年，这也是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20多年，你对城市生活的认识有什么变化？你既熟悉农村生活，也熟悉城市生活，曾说：新世纪以来，城乡都交织在一起，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……你认为要写好当下的乡村，当下的城市，难点是什么？

贾平凹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可以说，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。我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乡土的，写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。写《废都》的时候，那时的城市，人们的思维大多还是农民的思维，到了写《暂坐》的时候，城市越来越城市了。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们看到的东西，然后把它表现出来。

不管你写乡村还是城市，这要看你看到了什么，发现了什么，个人视野的扩大，关注和研究这个时代这个社会，你写的是具体的人的故事，又是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的故事，这样的写作才会有意义。

文汇报：《暂坐》的人物塑造别具一格：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缘汇集于西京城暂坐茶庄，被称为“西京十五”，犹如花瓣彼此相依构成你笔下的女性群像。生的活色生香与暗流涌动，死的不可控制与凄凄忧伤，犹如阴晴圆缺的转换，光亮与阴影呈现出生活真实的质地。她和她们，相互关照，相互联系构成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，她和她们又相互影响，相互映衬构成人物群落的命运流转，由此勾连出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众生之相。其中来自圣彼得堡的留学生伊娃是小说叙述中的贯穿人物，暂坐茶庄的主人海若是“西京十五”等姊妹的核心人物……在一部长篇中塑造女性群像诚非易事，涉及到衣食住行多个方面的细节，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积累，你还做了准备吗？你对哪些人物的塑造感到满意，还有什么遗憾吗？

贾平凹：对《暂坐》的第一二稿，改变了切入点，调整了结构后，再没有什么要准备的，后边写得很顺，书中的那些日常生活描写，我太熟悉了，用不着再去搜集什么。因为十多年来，我差不多每日都在茶庄喝茶闲聊，所写的庄主和她的一帮朋友全都是我的朋友，只要某一日有了想写她们的念头，提笔去写就是了。

文汇报：《暂坐》从俄罗斯女留学生伊娃在2016年重返西京开始，到她离开西京终止，小说呈现了“西京十五”等人物在这一年中，她们的百感交集与人生经验。她们完成了经济独立，追求自在体面的人生，不掩饰对物欲的向往，而人生旅途中心灵的慰藉，爱情的滋养成为她们的困惑，她们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另一半。这是你对当代女性的内心困惑，对现代人情感软肋的发现与呈现？

贾平凹：说明一点，不是一年，是几个月的时间。《暂坐》里的女子，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，她们是相对独特的一群人，过着相对独特的一种生活，但她们是西京城的，也是这个时代，社会的一个风向标，即便是微风，那叶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翻动。发现和表现人物灵魂的真实和情感的真正是小说的精髓。

文汇报：《暂坐》不仅关注她们如何面对现实与自我，还生动呈现她们之间的交往与关系，海若关心姊妹们的和谐与顺遂，但她不自高自大，而是平等相待，她说“大家都是土地，大家又都各自是一条河水，谁也不想改变谁，而河水择地而流，流着就在清洗着土地，滋养着土地，也不知不觉地该改变的都慢慢改变了。”这也是你编织与梳理人物关系时一种通达的观照。

贾平凹：人都在关系中存在着，所有的烦恼都来自没有寻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。《暂坐》中的女子就是不断地在寻找和寻找不到。我说过，风吹风也累，花开花亦疼。

文汇报：《废都》中的庄之蝶，《暂坐》中的羿光，是你在相隔20多年的长篇小说中虚构的作家形象，他们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，他们的精神气质不同，他们如何面对自我与物欲的选择，面对女性和情感的方式都不同，你对他们塑造的手法也不同，你对羿光的塑造中张弛有度，含蓄凝练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，你如何看待这两个人物？

贾平凹：庄之蝶和羿光是两个时期的人物，有相同处，也更有不同处，他们身上有好的东西，也有不好的东西，如果要比较，那羿光更成熟，豁达了。

文汇报：对，他的作家身份，他的学养才情，他的成熟豁达，让他成为她们心灵依赖的对象，虽然读者知道羿光是虚构的人物，但还是会联想他的身上有你的影子吗？他说：“对于婚姻寻对象，其实就是寻自己”，你认同他对婚姻的看法吗？

贾平凹：可能好多读者有这种看法吧，小说无论作者怎么写，都有自己的影子，这个人物是丰富复杂的，他是这个时代的产品。在生活的沼泽地里，人人都不是非白即黑的。我认同他的话，婚姻越久越对这句话有感觉，不幸的婚姻总是认不清自己，寻不到自己。

文汇报：《暂坐》在展开人物活动的场景时，很注重描绘市井生活，呈现雅俗并存的真实。如在阅江楼上，应后与严念初等谈话时，望向窗外的风景，城墙上的骑车人，城河边的钓鱼人，八角亭的唱秦腔人……与主要人物形成呼应，读来涉笔成趣：西京烟火，人间万象，无一不是你……

贾平凹：一棵树股杆奇崛着是一种表现，枝叶摇曳了是一种表现，《暂坐》里没有多少情节，这种日常生活的叙述就得靠细节让它活着，让它充盈，就得有一句是一句的讲究，除了交代线索外，任何描写都可以是闲笔，而哪一笔又是闲的呢？

文汇报：有位作家曾以为，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写伟大的小说。但现在他觉得，文学最核心的功能是理解生命，生命有痛苦和艰辛，而文学是让你去理解这个痛苦和未知的过程，然后接受和承担……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我们亲历了从寒冬走向春天的过程，我们体验了当下现实生成历史的过程，经历了这段见证历史，认识人性的特殊时期，你如何理解文学抚慰人心的价值，如何理解写作对于人生的意义？你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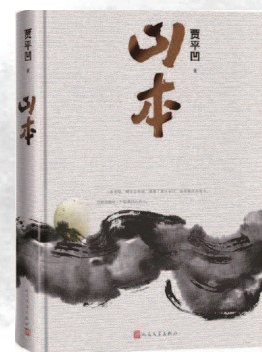
贾平凹：这种观点我认同，如果真把这一点写好了，那就是伟大的小说呀。写作关注的就是人类困境的问题，哪些问题困住了我们的心和心，是怎么困住的？中国近百年来的如何走过来的？我们看到了多少历史真相，看到了多少人性，又如何前行，对这些，需要有自己的思考，然后才能面对写作。

文汇报：你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。2018年出版50多万字的《山本》是你的第17部长篇小说，2020年7月将同时推出两部长篇《暂坐》和《酱豆》。请说说一个作家如何保持旺盛的创造力，一条大河如何才能水量丰沛？

贾平凹：我说过，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，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。



《当代》杂志2020年第三期，刊发了贾平凹的第18部长篇小说《暂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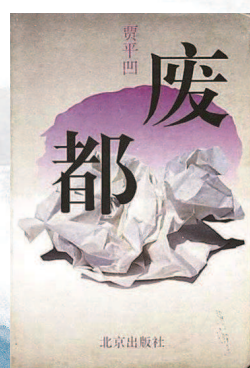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山本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老生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古炉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废都》 北京出版社



《高兴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种关注

《我是余欢水》热播后的思考——

法治如何寓于人心？

张文研



电视剧《我是余欢水》剧照

《我是余欢水》前段时间的热播，让一个艰难境遇中的小人物形象跃然于屏幕之上。尽管只有短短12集剧情，但男主角余欢水的遭遇引起了中年人的强烈共鸣——他挣扎着试图有尊严地活着，却陷于人情社会的罗网。面对着人情与法律的碰撞，欲望与守法之间的冲突，剧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使余欢水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但现实生活中，我们，要如何进行这场法治与人情的博弈却值得深思。

该剧由极端戏剧化的荒诞小说《如果没有明天》改编而来，原著与电视剧作为讽刺喜剧，其目的是突出现实矛盾，以吸引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和反思。剧作以夸张手法与嘲讽态度，通过描写人情与法治矛盾，展现对象的可笑及其与现实的残酷碰撞，并以此凸显值得同情人物身上的缺点。同时讽刺往往包含善意的批评，在反映现实的同时，也具有较弱的教育引导作用。

剧中男主角的身边处处体现着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的矛盾冲突——公司因为三次迟到就扣除员工的底薪；余欢水撞破老板私密后反遭职场打压；欠债不还的好朋友仗着交情反向余欢水叫嚣；邻居自私无理，不是养狗无德，就是装修的电钻声扰民还威胁警告不能耽误施工；撞见造假电缆勾当，而被各种威逼利诱等等。

余欢水的隐忍退让、得过且过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地鸡毛。最为讽刺的是，一个向来遵纪守法守法的“忠人畜”，却成了剧中活得最悲惨的人；在束缚他的人性牢笼中，最缺乏的却是人情味。这部喜剧讽刺的深刻性也得以呈现，透过喜剧性的人物形象，并以夸张与喜剧的手法，描写小人物的一系列倒霉事，体现余欢水因面子而遭到的反噬，从而刻意体现人情与法治的冲突。本剧成功塑造了一个人人有感的小人物形象，并通过描写其在生活中受到的各种嘲弄，展现主人公以人情对待法律问题的卑微与无力。本剧以幽默感包装讽刺力，让人们在嘻笑的同时，亦产生压抑的同感。此种

寓笑于哭、笑中含泪的手法，使剧集在喜剧的底层涌动着人情社会中人物的是非悲喜，直接无视了人情社会对法治精神的消解，描写因还未适应转型过程而“落后”的人物在生活中盲目挣扎的悲剧性。

余欢水以人情处理问题的方式并非偶然，从中反映出的是由人情社会迈向法治社会过程中的阵痛。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历史传承，指导着社会主体的思维与行动。中国自周朝以来即以“礼”治天下，讲究敬德保民，由此造就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观念，厌恶不近人情、轻视既定规则。

当然，传统社会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有“讲情理的精神”，也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社会原则，指导我们天下大同，美美与共。但以和为贵并不是窝囊忍受。生活中的不合理与不合法，不应成为让人无法忍受的“丧”。

在我国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高速与关键时期，新鲜事物不断涌现，难免有一些旧性积习沉渣泛起，正如剧中所描述，法治与人情的矛盾更为突出。当今中国，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推进，传统的治理手段难以实现有效控制；同时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要求通过竞争机制、价格发现来实现，其中充满了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，这就要求形成一套不被个人凌驾的市场秩序。然而人际关系中，传统的差序格局并未随之消失，借助移动互联网设备的帮助，以血缘、亲缘、地缘等传统关系为基点，以同学、同乡、同事、同趣、同群等衍生关系为依托，关系社会、人情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，秩序由人情纽带来固守反而矛盾重重。

这本质上体现的仍是社会观念与社会机制的矛盾冲突，是法治社会建设与人情社会传统的冲突。电视剧可以设计情节与人物，主人公可以突然开挂、绝地反弹。但现实生活中，面对这些冲突，人情社会也愈发

力。要解决这一矛盾，关键是要革除关系社会、人情社会的消极思想观念，打破“差序格局”和“潜规则”的牵绊，以法律维持理性的社会秩序，运用制度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。

“法安天下，德润人心”。在现实社会中，人情对待法律问题的卑微与无力并不鲜见，但人情与法治也并不如剧中那样必然冲突，法律不能取缔情理，情理也不可压制法律。尤其在社会转型期下，更需要“人情”与“法治”的协调促进。需将法治寓于人心，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温情的生活方式，方可与“人情之治”和谐共生。

欲将法治作为生活方式，使“情”“法”融洽，需培育法治文化，发挥文化的滋养和感召作用，以其特有的行为范式影响民众的行为模式，通过推动公民学法、守法、用法，培养和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，且民众对于本国法律的接受程度越高，越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法治文化共识和认同。作为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，法治文化的建设作用越发凸显，它推动着法制的落实，保证着法制的成果能够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。国家需要文化支撑和法治建设，亦需要文化的发展去提高法治的深度和广度。

当法律体制既成，只有确立法治信仰，才能将法治观念真正注入人心，用法治帮助建立秩序世界，治疗生活中的“丧”。只有民众对法律抱以信任，有公心的人才多起来，进而反哺中国的法治进程，主动批判人情文化中的糟粕，而保留其中有益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源，形成现代法治与传统人情的和谐与平衡。《我是余欢水》也正是在辛辣针砭时弊的过程之中，通过小人物的脱胎换骨——抛弃无用低效的人情面子工程转而用法律手段维护秩序，让我们看到当法治文化逐渐深入人心，成为一种信仰、一种价值之时，人们才能有尊严地、更好地活着。

(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特聘副研究员)